



青年时期的茅以升

# 姑父茅以升和姑妈半个多世纪的伉俪情深



1962年茅以升与戴传蕙金婚纪念



1983年茅以升来沪时与本文作者一家合影，作者戴平为后排左一

## 【作者简介】

戴平 上海戏剧学院原党委书记、教授。1991年被中组部评为“全国优秀领导干部”，1993—2003年为上海市第九届、第十届人大代表。主编《戏剧美学教程》《中国民族服饰》。著有《戏剧——综合的美学工程》《中国民族服饰研究》《聆听戏剧行进的足音——戴平戏剧评论选》等。

◆ 戴平

世纪相濡以沫的生活轨迹：有苦有甜，有喜有悲，但动荡播迁多于安适恬静，奔波劳顿胜于宁静福祥。

姑父自幼至老，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，勤于外事，疏于内务，向来不问家事。工作变动，举家搬徙，往往“事发突然”，姑妈的操劳可想而知。租房退房，运送购置家具，重起炉灶等诸般杂条已够劳累，而他们有6个孩子，退学转学，不能延误学业更是搬迁中的头等要事，亦要靠姑妈一人来精心安排，姑母是姑父的一位出色的贤内助。姑母前半生最羡慕妇女能自立工作，叹息生不逢辰。1964年，她听说女儿于美到农村搞“四清”，写信给她：“你下乡搞四清，我时常纪念，见你来信，我恨不得也去乡下吃苦，可惜我连这吃苦的资格都没有，真是白吃人民的小米了。”“人人我太多，我为人人太少。”由此可见姑妈的一种心态，她不甘心在家里吃闲饭。一次，她到机关单位，见办事人员的桌上放有“秘书处”“会计处”这样的小座牌，受到启发，于是自制小座牌一个，用工整的毛笔字写上“秘书处”三个字，放在书桌上。姑父见了哈哈大笑，称赞妻子的秘书工作做得好。

的确，姑父工作忙碌，尤其是在他外出期间，姑妈收发书信，接待来访者，管理一应杂务，做到一丝不苟。姑父回家，看见桌上整整齐齐的报刊、文件、书信以至记录电话内容的小条子，夸赞她是个称职的好秘书。姑母管家井井有条，《年谱》中写道：她有一本“备忘录，无论什么事，一查便知，重要日期、人名、地址等都有记载；对各种生活问题，都有计划安排，不会误事，简直是一部编年的‘国民经济计划书’”。

## 名字和大桥连在一起

杭州民间有几句歇后语：“钱塘江上造桥”，“两脚踏过钱塘江”，意为不可能。《年谱》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，是姑父领衔花了三年时间，历经“九九八十一难”，终于建成钱塘江大桥。1937年9月26日，大桥竣



▲ 茅以升和妻子戴传蕙与他们的四个女儿

◀ 1961年戴传蕙照片

工。姑母在长沙听到这个喜讯，一块大石头落地，身患多年的抑郁症竟豁然痊愈，慢慢地，连顽固的失眠症也奇迹般地好了。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心病终须心药治”，大姑母的欣喜是与丈夫的命运紧紧相系的。

但是，大桥造成，日寇侵华，为防止日本侵略军利用大桥，茅以升接到上级的炸桥命令，挥泪断桥。1937年12月23日晚，杭州沦陷。大桥工程处撤退到浙江兰溪。《蕙君年谱》中对炸桥事记载：“1937年11月17日，钱塘江桥公路通车，我乘的12号小汽车首先过桥，算是过钱塘江桥的第一辆汽车。这天杭州全市居民，争以过桥为快，万人空巷，极以一时之盛。然而为了炸桥，炸药及引线，已在桥上安放，过桥者履险如夷，无人知悉。……钱塘江桥于12月23日下午5时，因日寇迫近，为我方自动炸毁。三年心血，我修我炸，痛心无已。”这在世界造桥史上，可谓空前绝后。自己造的桥自己炸，轰然一声，大桥坍塌，姑父心痛吐血，大病一场。

造桥功绩不可磨灭。1941年10月20日，中国工程师学会在贵阳召开年会，给姑父授予“名誉奖章”，表彰他为建成钱塘江大桥的劳绩，回到家里，姑父将奖章奖状给姑妈看。姑妈对姑父说：“钱塘江桥，你出了力，而且是你一生最大的成绩，然而并非你一人的功劳，所有的工程师、工人、职员都有份，给你奖章，只是把你当作众人的代表而已。”姑父听了此语言，深以为然。在年谱中记载说：“语意非常正确。”贤内助，在这里，的确不是一种溢美之词。

更足以令姑父自慰的是，由他负责建造的钱塘江大桥，在经历了亲自建造、炸毁和修复的三个阶段之后，至今依然屹立在钱塘江上，80多年风雨潮汐的侵袭，没有任何损伤。它的建成是中国造桥史上的一座丰碑。姑父的名字也同这座大桥一样不朽。

## 为上海解放做出贡献

1949年5月初，上海解放前夕，风声鹤唳，汤恩伯兵败如山倒，上海市市长易人，由陈良出任上海市市长。陈良的妻子李佩娣是姑父留学美国的同学。她到姑父家，劝说姑父出任上海市政府的秘书长，协助陈良工作。姑父坚持不从，态度十分明确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姑妈也支持他的决定，劝说他住医院躲避一阵。姑父接受了姑妈的建议，入同济大学附属中美医院不出，陈良对他也可奈何。同时，姑父却和地下党保持密切联系，加入了一个进步组织“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”。当时，姑父接受了地下党交办的两件事：一是国民党军队撤退时，勿要破坏上海工厂；二是有300多名学生被捕，上海解放时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。姑父找到了李佩娣，陈说上述两点意见，劝说陈良给自己留一点后路，陈良接受了姑父的建议。姑妈听说后，也对姑父说：“这样你可以放心了。”

过了20多天，上海解放，全市工厂无一被毁，被关的300多名进

步学生全部出狱。上海解放后不久，陈毅市长约请上海各界人士座谈。他见到姑父，立即和他握手说：“我知道你对上海解放是有贡献的。”姑父也感到很欣慰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姑父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，任交通大学校长、铁道科学研究所所长，全国人大常委会，后任全国科协副主席、九三学社主席、全国政协副主席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。人民大会堂的力学结构是他最后签字的，人民大会堂的名字也是他取的。毛主席曾四次接见他，并和他共同进餐。1987年秋天，他以92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。《蕙君年谱》中有确切记述。

## 他为孙女取名茅为蕙

年谱中还有许多家事的记载，包括教育子女、子女成长的记载，虽是零星记述，事多细微，但也可以见其为人和对妻子的怀念。

1965年，姑父72岁生日，收到女儿于璋、于冬从国外送来的一份寿礼，是一台黑白电视机。电视机通过邮局寄来。打开一看，因没有调试好，有形而无声。姑父命儿子于润到商店去修，得以观看。当时电视机是十分稀罕之物，普通百姓家没有此物件，但这个电视机的屏幕，只有一个香烟盒大小。于璋、于冬都是在美国工作的科学家，大姑父是一位顶级的大科学家，和姑母坐在一起观看一台黑白电视机，看得津津有味，屏幕比9英寸电视机小得多。时间相隔50年，科技发展之落差，竟是如此之巨大！

《年谱》末，姑父对妻子的一生，用以下的一段文字作了总结：“一生惜为病困，自幼缠足，遗恨终身。六十以后，手臂经常疼痛，早起两眼模糊，需要点药水。六五以后，每冬蛰伏，春天来到，就说：‘马路上看看，也是高兴的。’后来，总怕病不得好，每早起床，喜形于色，说‘又树起来了！’平时体质虽弱，而老不能闲，每月还做不少小事。性爱洁，痰盂向来自理，年逾七十，不显老态，由于眉眼素美，常人有意，为何这样好看，勤劳成习，巨细关心，直至最后，言行依旧，神明不衰。”短短不到两百字，写出了姑妈的一生行止，也写出了姑父对妻子的一生钟爱和真情。姑妈于1967年1月13日去世，享年73岁。姑父写下的挽联：“一世操劳，半生忧瘁，负卿曷极；满门遗爱，万里留芳，惠我何多。”

1972年，姑父心爱的小孙女出世，茅以升特地为她取名“为蕙”，即是后来拍摄电影《巴山夜雨》的小影星茅为蕙，这也饱含着姑父对爱妻的深切思念和纪念之情。



## 茅以升“目眩神移”

我的大姑母戴传蕙，姑父一直呼之为“蕙君”。大姑母出身书香门第，气度端庄娴雅，脸庞圆润，一双大眼睛动人含情，知书达理，写得一手秀丽的小楷。大姑父和她一见面，就非常喜欢。1912年，姑父18岁，于扬州小东门粉粧巷戴府与姑母成婚。《年谱》记曰：“六月十九日申时，我往戴府，成礼，登堂时见灯烛辉煌，宾朋引领，蕙君衣轻毅，曳罗裙，云鬓蛾蛾，容光焕发，我和她行礼时，目眩神移，莫知所措。”结婚时，姑父送给妻子的礼物是沈三白的《浮生六记》。这也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展示了不平凡的前景。

结婚后，姑父回到唐山路矿学堂（唐山铁道学院前身）读书，毕业后又公派去美国留学，妻子独自带着长子茅于越在婆家过大家庭生活。1917年，姑父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获得硕士学位，但夫妻分居，妻子每月带孩子零用仅两元，但姑父无力接济。生活虽然辛苦，但夫妻都不觉为苦，他们时有通信，述说别离之情。秋天，蕙君寄姑父一信，内有照片一帧。蕙君单身独坐，夏季服装，下着黑裙，照片后亲笔书写杜甫诗“月夜”两句：“何时倚虚幌，双照泪痕干。”姑父在年谱中记曰：“为之惆怅不已。此照我复印多帧，不时取出对看，纸上温存。有一次蕙君来信，提到唐诗‘闺中少妇不知愁’，云‘为何不知？’”其中夫妻的恩爱之情，至今读来，依然十分感人。

姑母是戴氏长女，我的父亲戴传安（字筱尧）是九弟。至“文革”初，姑妈的九位同胞手足，只剩“一头一尾”，所以大姑母一家和我们一家关系特别亲密。1981年我到北大进修美学，节假日常住在姑父家；大妹也有一段时间到北京照顾姑父。1967年姑妈去世，姑父极其伤感。至1970年，姑父的感情稍微平复，为纪念“蕙君”，也为后人“有一番交代”，在76岁时写完回忆妻子的《蕙君年谱》一稿，自她19岁出嫁写至终年73岁，共10万字。

## 出色的“贤内助”

我最早见到姑父的《蕙君年谱》，是他用钢笔字写成的手抄本。表姐茅于美和茅于燕都抄写过原稿。他的大外孙徐安泰帮忙誊抄，有一次抄写结束没把墨水瓶盖上，遭到一向好脾气的姑父的训斥，因为“一旦墨水瓶打翻，摊在桌子上的稿件就要全功尽弃”。书成，先在亲友中争相传阅，个个爱不释手，希望多印几本。姑父见我的大弟戴群能写一手好字，并会在钢板上刻蜡纸，便把手稿交付于他，让他刻写。大弟利用上下班的业余时间，对着原稿，认真刻写，花了四个多月，完成任务，居然一字不错。130多张蜡纸，卷放在一个纸筒里，挂号寄送北京。姑父收到领取邮件通知单，时值隆冬，他穿上大衣，亲自到邮局去取，珍藏于

书房内。“文革”结束，我在上海找地方油印了十多份，装订成册，他看到后非常高兴，分送至亲。

大表姐茅于美是一位诗人。她曾有诗记述《蕙君年谱》：“夜夜灯前抄年谱，几回泪涕满衣襟。征途驰骋非平坦，往事凄迷写逼真。险境惊呼怜处处，亲人重忆恋频频。百年似此人间少，何幸相依过半生。”这八句诗，道出了姑父姑母共同生活55年的甘辛。

《蕙君年谱》实际上是姑父茅以升的一本自传。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相互离不开。姑父在序中写道：“书中关于我的记事特多，似成我的自传，我的一生是和蕙君分不开的。所有我的事业，都有蕙君的一份。”《蕙君年谱》行文简约，家庭琐事，细细道来；笔触淡泊，风吹草动，一带而过。文短情长，能看出他们半个多